

# 超越二元、以人为本 ——解读彼得·凯里小说文本中的伦理思想

彭青龙

(上海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240)

**摘要:** 澳大利亚著名作家彼得·凯里的两部伦理主题小说《幸福》和《偷窃一个爱情故事》颠覆了非此即彼、泾渭分明的传统道德思维模式,蕴含着超越二元、以人为本的伦理思想。面对着强大的社会制度,小说中的人物陷入了种种困境而难以自拔,迷失于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道德抉择,在善恶两级的滑动和反复中,异化成既非圣洁天使,也非十足恶魔的精神分裂者,彰显出人性的复杂和多面以及道德主体身份构建的艰辛,主人公最终回归道德高地,体现了作者宽厚包容的人文主义精神。

**关键词:** 彼得·凯里 《幸福》;《偷窃一个爱情故事》;道德;伦理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544(2015)04-0077-05

**Abstract:** *Bliss and Theft A Love Story* by Peter Carey, the well-known Australian writer, subvert the traditional ethical thinking mode of black or white with more humanistic concerns towards morality issue, in an attempt to transcend the dualism.

Overwhelmed by the powerful social systems, the characters in the stories, more often than not, are imprisoned in one way or another. They get lost morally in choosing the authentic from the fake, the kind from the wicked, and the beautiful from the ugly, and make themselves, in a sense, schizoids who are neither holy angels nor unpardonable monsters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two polarization of extremes, revealing the complexity and multi-facetedness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hard in constructing ethical identity. The return of leading characters to the ethical upland, as the end of the stories show, is a demonstration of the author's liberal humanistic spirit.

**Key words:** Peter Carey; *Bliss*; *Theft a Love story*; moral; ethical

DOI:10.16362/j.cnki.cn61-1023/h.2015.04.021

彼得·凯里曾两获布克奖,是“继怀特之后,再一次把澳大利亚文学带到世界文学版图上的最著名作家”(Jose 2005: 140) 其文学创作的独特性之一在于运用兼容并蓄的艺术手法,将个人困境的现代性书写与民族困境的历史性拷问有机结合起来,并通过细节描写和人物塑造,来阐释和揶揄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也正由于此,他被称为“澳大利亚文化的代言人”(Turner 1993: 131),“民族神话的制造者”(Craven 2003: 14)。但这种美誉只是就其文学思想中回归历史本真性的后殖民主义史观而言,而没有涵盖其回归人性本真的人文主义道德观。事实上,无论是历史题材小说,还是现实题材小说,道德伦理都是他文学创作思想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维度,甚至是重要的主题之一。从《奥斯卡与露辛达》文本中所表现出的对土著人遭屠杀的同情,到《凯利帮真史》中对“丛林强盗”内德·凯利颠覆性的描写,再到为《杰克·迈格斯》同名主人公的“正名”,无不体现他揭穿历史谎言、去伪存真的批判性态度和为弱者伸张正义、维护公平的社会责任感。在围绕欺骗、偷窃、腐败等主题的小说创作中,他凭借独到的观察力和想象力,勾勒出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现代人生活画卷,不惜笔力对真、善、美进行讴歌和颂扬,对假、恶、丑进行鞭挞和讽刺。与此同时,在

刻画道德主体时,他将其置于物欲横流的社会语境中,鞭辟入里地描写其欲罢不能、欲迎还拒的微妙心理,表现了现代人道德主体分裂的本真状态。本文以他的两部长篇小说《幸福》和《偷窃一个爱情故事》(以下简称《偷窃》)为例,试图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揭示其小说文本中所蕴含的超越二元、以人为本的伦理思想。面对着强大的社会制度,小说中的人物陷入了种种困境而难以自拔,迷失于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道德抉择,在善恶两级的滑动和反复中,异化成既非圣洁天使,也非十足恶魔的精神分裂者,彰显出人性的复杂和多面以及道德主体身份构建的艰辛,主人公最终回归道德高地,体现了作者宽厚包容的人文主义精神。

《幸福》和《偷窃》分别发表于1981年和2006年,出版间隔长达二十多年,但就其描写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堪称伦理主题的姊妹篇。前者是凯里长篇小说的处女作,刻画了一个广告商人三次死去、三次复活后的经历,后者则凯里的第九部作品,叙述了一个艺术家陷入偷窃骗局后的生活变迁。两部小说都与凯里的生活存在某种程度的互文性,前者以他在广告公司的工作经历为原型,后者与他移居海外、离婚和从事艺术创作有关。更有意思的是,两部小说都以20世纪70、80年代为背景,故事围绕家庭、爱情、

事业的矛盾冲突而展开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它既反映了当代澳大利亚人的民族心理 也折射出他们的道德危机。

凯里将两部小说的人物和事件置于澳大利亚 70、80 年代的历史语境 体现了他“对精神世界风云变幻的敏感性”(Leavis 1955: 22)。美越战争以后 西方各种思潮开始涌入这个因“无情的距离”而疏于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大陆 从此澳大利亚结束了偏安一隅的状态。受到美国文化的巨大冲击 澳大利亚本土文化日渐式微 而崇尚美国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渐成潮流 一时间人们热衷于开美国汽车 听美国音乐 看美国电影 甚至在高雅文化和艺术领域 也摒弃“澳大利亚化”传统 创立更具国际化 尤其是美国化色彩的新文学和新艺术。虽然有一部分头脑清醒的澳大利亚人认识到“美国是最好和最坏的资本主义化身——自由、无节制的消费与失控、充满竞争的个人主义并存 即媒体上所勾画的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混合体。”(Turner 1994: 98-99)“具有美好前景的现代性和经济上消费驱动的野蛮性”(Bell 1993: 203) 但由于澳大利亚急于在世界舞台展示自己的新形象 因此即使有“美国化威胁澳大利亚文化身份建构”的声音(Carter 2000: 71) 也被唯美国马首是瞻的众声喧哗淹没了。于是 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和道德情怀的凯里就从 70 年代开始 相继发表了许多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 试图唤起人们对于美国化现象和由此带来的道德伦理问题的反思,《幸福》和《偷窃》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幸福》是一部荒诞和真实相结合的伦理小说。主人公哈里·乔伊是一位年近四十的广告商 在一次电闪雷鸣的暴风雨中 被断裂的树枝压至重伤 虚幻中他仿佛看到自己“叩开了地狱之门”。“死”后重生的经历 不仅使他笃信好人生天堂、坏人下地狱的理论 而且在家庭生活和生意场上 践行乐善好施的道德操守。这种脱胎换骨的变化 与追求美国生活方式的妻子和幻想做探险家的儿子产生了矛盾,一场冲突之后 妻子自杀 儿子暴死他乡 乔伊与来自乡下的情人哈妮·巴巴拉重归于好 在博根阿泥路的森林深处 过起了世外桃源的幸福生活。75 岁时一棵他亲手种植的树正好压在他身上才最后死去。表面看来 整部小说只不过是一个多少带点怪异和神秘色彩的现代寓言 描述了一个普通家庭的生活变迁 说明了一个好人有好报的朴素道理,事实上 怪诞中“蕴含着严肃的道德主题”(Stewart 1982: 88)。一方面 小说将个人的道德价值取向变化与商界的公司伦理连在一起 因而道德意义严肃。另一方面 它又通过超现实主义手法 让主人公远离生活 进入神话世界 从而消解了这种严肃。这种既非传统、又非现代的写作手法 使凯里的处女作别具一格 并充满美学价值和道德张力。

乔伊弃恶从善、追求美好的行为与妻子贝蒂娜和儿子大卫的物质精神诉求格格不入 矛盾冲突不可避免。作为一个成功的广告商人 大难不死的乔伊似乎听从了内心道德主体的呼唤 誓言不再挣不道德的钱。当得知自己客户克雷佩化学制品公司的产品里含有致癌成分时 他断然拒绝为这家老客户制作广告 即使损失唾手可得的两百万元

利润也在所不惜 朋友和同事对他的“反常”决定惊讶不已 认为他已经疯了 贝蒂娜更是十分恼怒 因为没有丰厚的利润 她的“美国梦”就无法实现。贝蒂娜是一个不受邻里喜欢、说话粗野的中年妇女 对美国生活方式早已心驰神往 渴望有朝一日去纽约定居 “她与美国人交往 阅读他们的杂志。她悄悄存有一笔私房钱、锻炼身体 期待梦想成真的那一刻。她有时想——不可否认她幻想着、梦想着 解决她的问题的最简单方法就是乔伊在睡梦中静静地死去。”(21) 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她纠集十六岁的儿子大卫、美国佬情人乔尔以及克雷佩化学制品公司市场部经理阿德里安·科伦恩斯等人 决意把乔伊送到臭名昭著的精神病院 希望那里的严厉管教能够使“改过自新”。然而 精神病院并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帮助“病人”康复 而是把它当作挣钱的机器。院长爱丽丝毫不掩饰地宣称“这是生意 我做生意就是为了赚钱 就像其他人一样……到了年底 我们必须公布利润”(138)。为了降低经营成本 医院采用“饿其体肤”的方法对付病人 如果稍有不满意 他们就被“带到电震台 在你的头上安插点锡片和其他金属片 然后医生就会开动电路”,“那是一种你难以想象的黑暗 漆黑无比 像死一样的感觉。”(159) 由于不堪忍受这样的折磨 病人只好交钱赎人 离开此地。凯里在小说中将贝蒂娜、科伦恩斯、爱丽丝描写成丧失道德伦理之徒和腐朽资本主义制度的卫道士 显示出作者对乔伊的同情 他的德行之所以为贝蒂娜所不容 是因为他违背了资本主义社会惟利是图的价值观。

精神病院是统治阶级软权力的化身 发挥着监狱的功能 行使着社会规约的权力。凯里描写乔伊被投入精神病院 不仅表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强大 而且通过一种诙谐幽默的方式来展示精神病院的教化功能和乔伊的精神分裂状态。为了帮助乔伊“改邪归正” 院长安排另外一个人跟他同住一屋 并在床头都写着“哈里·乔伊”的名字。冒名顶替者是他公司里的高级财务主管亚历克斯·杜瓦尔 表面上他是一位“讲原则的人” 实际上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 一手接生产致癌产品公司的订单 一手将撰写的致癌实情报锁进抽屉 以备“革命者调查时能给他一个公正的评判”(77)。受到爱丽丝的指使 他来到精神病院监视乔伊的言行,“在本子上记录着哈里·乔伊的一切: 他说话的样子、他的音质、他蹙眉头的习惯、他走路漂浮的风格和他双臂交叉的姿势。”(148) 试图规劝乔伊像他一样 认清现实 及时行乐,“你是一个孩子 世界上刚刚出现的理想主义者 因为整个西方世界都建立在能致癌的事物上 并且还在夜以继日地在生产。”(131) 小说中 杜瓦尔极尽模仿之能事 以至于乔伊本人都分不清哪个是杜瓦尔 哪一个哈里·乔伊 甚至逐渐认为 亚历克斯·杜瓦尔就是哈里·乔伊。凯里借助描写乔伊在精神病院的奇特经历 旨在表明杜瓦尔是乔伊的另一个自我。在资本主义势力软硬兼施的淫威下 他的道德主体身份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暗示乔伊不得不摒弃他之前所信守的道德价值观 向统治阶级势力屈服。

面对强大的社会制度,乔伊被迫回到贝蒂娜的身边重操旧业,从一个弃恶从善者沦为精神分裂者。他的蜕变一方面是外部条件使然,是贝蒂娜施加压力的结果,“如果你不重新做生意,我不会给你钱的……现在这是一个交易,仅仅是个交易。如果你再疯疯癫癫,我会把你关更长的时间。”(173)另一方面,也是乔伊内心欲望所致,他喜欢金钱所带来的享受,离不开高级餐厅里的红酒和舒服体面的白色真丝衬衫。从弃恶扬善,热心做好人,到弃善扬恶,甘心做坏人,继续制作违反企业伦理的广告产品,至此道德的天平又倒向丑恶的一极。小说中凯里似乎将乔伊的道德变化归结于社会环境和他性格的软弱,既增加了故事的可信度,也使人物的思想情感更加丰满。

乔伊道德主体的分裂还表现在他的情感和家庭生活中,从而使企业伦理和家庭伦理两条线联动起来,推动着故事向前发展。乔伊在身体恢复期间,一直在观察和记录周围人的言行,试图验证天堂—地狱理论。无意中他发现了妻子与合伙人乔尔关系暧昧,儿子和女儿背地里口交乱伦,失望和愤怒之余,他离家出走,住进了一家高级宾馆。在这里他认识了农忙卖蜂蜜、农闲做妓女的乡村女孩哈尼·巴巴拉,两个人都认为,世界建立在“臭狗屎上”,吃的是垃圾食品。相同的价值观使他们迅速坠入爱河,并相约远离尘世,去乡下过平静的生活。然而,经过在精神病院的“洗脑”之后,乔伊违背了自己的诺言,致使芭芭拉独自一人回到乡下。具有戏剧性和讽刺性的是,正当贝蒂娜的广告帝国日渐成型之际,她被告知身患癌症,且已是晚期,至此她幡然醒悟,“她的一生都建立在臭狗屎上。”(240)绝望之余,她炸毁了自己苦心经营的广告公司,与美国佬情人双双殒命。与此同时,受美国文化不惑而痴迷于做探险英雄的大卫,也变成了大毒枭而暴死他乡。他们的死亡诠释了整部小说所贯穿的恶人下地狱的伦理思想,同时也似乎向读者表明,美国文化和伦理价值观是走向灾难和死亡的根源。

利奥波德被誉为当代环境运动伦理之父。在他的《大地伦理》一书中,他提出了对生态思想影响深远的“大地伦理”的概念,大地伦理把道德权力扩展到动物、植物、土地、水域,以及其他自然界的实体,确定他们在一种自然状态中持续存在的权力(徐其萍 2009: 72)。小说田园式的结局使主人公的道德主体身份最终确立。乔伊在贝蒂娜和儿子死后驾车逃到芭芭拉的居住地——博根哈尼路的热带雨林,但也许是为了惩罚乔伊的出尔反尔和对芭芭拉的失信,她拒绝跟他搭讪和来往。乔伊只好独自在森林的边缘地带建屋谋生。五年里,他通过讲故事和辛勤劳作,逐渐赢得了当地居民的信赖和尊敬,芭芭拉也原谅了乔伊的过失,一起过上了美好的生活。这种通过劳动洗炼心灵,通过行动赢得爱情的描写既合情合理,又富有哲理。凯里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整本书的成败都建立在小说的最后一章——‘蓝面包与蓝宝石’并且我确实希望小说能张扬一种仁爱精神。”(Neilson 1987: 66)这种仁爱精神实际上就是通过回归大自然,进行灵魂的自我救赎、张扬抑恶扬善的人文精神。小说

中的两个女人分别代表了道德中的两极:贝蒂娜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势力的代表,自私、残酷、堕落和腐化,而巴巴拉则是田园生活的化身,健康、单纯、甜美和善良。前者在童话故事里是邪恶的荡妇,后者则是引领乔伊逃出地狱、走向天堂的美丽天使。乔伊最终与天使结合,意味着正义战胜邪恶,完成了道德主体身份的构建。也使小说的政治隐喻不言自明:是拥抱腐朽的美国文化?还是张扬具有乡土气息的本土文化?

如果说《幸福》是一部田园式伦理喜剧的话,《偷窃》则笔调略显沉重悲喜交织的情景剧。前者着力于建构民族神话,并确立道德主体身份,后者则剥去艺术神话的外衣,将腐烂的伦理肌体暴露在阳光之下。前者以第三人称叙述了一位商人的无奈和挣扎,后者以第一人称似乎在向世人倾诉一位澳大利亚艺人的失望和孤独。无论是建构还是解构文化或者道德主体身份,两部小说都让人体味了当代澳大利亚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追求。

《偷窃》是一部揭露画界艺术欺诈的小说。迈克尔·波恩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北部小镇的一位画家,因偷窃原本属于自己却被法院判给前妻的画作而锒铛入狱。1980年被释放后,跟先天痴呆的弟弟休相依为命。一个暴风雨的夜晚,二十八岁的漂亮女人马琳·莱布维特兹闯入他们平静的生活。不久,邻居道兹·伯兰家收藏的名画不翼而飞。警察怀疑是迈克尔所为,没收了他的所有画作。迈克尔与弟弟逃到悉尼,此时马琳再次出现,两人迅速坠入爱河。随着两人交往的深入,迈克尔辗转东京和纽约,深陷偷窃的骗局而难以自拔,画界的丑恶逐渐浮出水面:知名画家遗孀多米尼克与情人狼狈为奸,企图霸占丈夫的所有作品;鉴定家奥利弗凭借所承袭的画作真伪鉴定权,为冒牌货开辟绿色通道;收藏家伯兰则充当名画走私的帮凶,为赝品通关提供掩护;马琳则为了寻找公公遗留的价值连城的名画,千里迢迢从美国赶到澳大利亚,冒雨入室盗窃,并借帮助迈克尔去日本举办画展的机会把名画带出海关。整个画界俨然是一个充满暴力和欺诈的利益集团,他们相互勾结,共同左右着艺术消费市场。当迈克尔看清马琳的嘴脸后,毅然与智障弟弟一同回到了澳洲内陆小镇(彭青龙 2011: 189)。

主人公迈克尔的艺术人生,蕴含着凯里对现代绘画艺术价值的深层思考——是坚守艺术个性还是在艺术的现代性中迷失自我。小说的独到之处在于以第一人称由迈克尔和弟弟休交替叙述,刻画了画家内心的失落、愤懑、孤独和迷茫。迈克尔出身于家境贫寒的屠夫之家,幼小时受到小镇上一位德国艺术家的影响,从此走上了绘画创作之路,并逐渐有了名气。家庭的破裂使得迈克尔元气大伤,画作也无人问津。他试图东山再起,甚至摒弃他原有的风格,来迎合市场的变化,“相当一段时间,我在纳瓦尔的坝地上,创作了许多与以前风格迥异的画。”(41)但情况并未因此而好转。事业的挫败感让迈克尔感到人情冷漠和世态炎凉。“不管你怎样

把脑袋瓜子刮得精光或吹嘘你在澳大利亚艺术界的地位,但这一切又似乎没有什么把握。这一分钟你是国宝,在赖德有豪宅,下一分钟你就得靠你弟弟的伤残抚恤金来购买多乐士。”(23)来到纽约后,迈克尔的信心更上一落千丈,弟弟休观察到“我哥哥来到纽约,饭店里没有一个人听说过他的名字。没有一个人向‘曾经伟大的迈克尔·布切尔·波恩’致敬,对此他非常恼火。(251)”而与此相对照的是,二十世纪的现代派画作受到追捧,画商、鉴定家不择手段地搞到大师的画作,利用搜索光、红外线和X光片等高科技进行“修补”,赚取大量钱财。“这两幅作品都是他妈的臭狗屎。它们竟然卖了八十万。这就是纽约让我费解的地方。八十万元啊。”(212-213)迈克尔的感叹表明“名画不再是高雅的艺术,而是扬名立万的商品,创造文化、艺术的主体已经消散,个人情感、审美取向、价值判断、甚至创作激情都必须从属于商品化与技术的规范”(彭青龙 2011: 188)。

然而,凯里似乎没有将迈克尔刻画成一个完全从属于商品化的艺人,而更多地塑造造成深陷困境但依然没有泯灭创作激情和艺术道德的人。迈克尔出狱后,“不仅失去了八岁的儿子,还失去了在悉尼的房子和画室”(1)无奈之下,他只好以赠送一幅画的代价,在收藏家保罗的农场里赢得栖身之地。尽管这里是新南威尔士州的荒郊野外,经常断水断电,蚊虫肆虐,甚至没有像样的作画原料,但他依然坚持一边照顾弟弟休,一边千方百计地进行艺术创作。由于他的画作属于落伍的旧式笔法,没有像市场期待的那样与时俱进,因此曾经炙手可热的画作也变得一文不值。正当他走投无路之际,马琳的出现再次燃起了他的希望,不知不觉中陷入了她的情网,充当其偷盗和制作赝品的帮凶。即便如此,他内心的分裂在小说的叙述中时隐时现,并在提笔帮助马琳修复价值百万的名画《带电的怪人》时表现得十分充分。“我要在‘怪人’上面画画,把它像骗人的文物一样埋掉。”但没过一会儿,他又感叹“我不能再在‘怪人’上画画,这样不但会毁掉它,而且再也找不到了。”(241)迈克尔的犹豫不定显示出他内心中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之间的艺术道德的角力,“羞愧,怀疑,自我厌恶,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家常便饭。”“在这里我变成了冒牌货,真他妈的丢人,请让我为自己的堕落公开道歉。”(231)

羞愧是罪恶感增强的表现,意味着迈克尔内心道德意识的觉醒。但凯里似乎并不在此止步,而是通过迈克尔对“偷窃”和“爱情”的疯狂,使两者之间的张力达到极致,从而为故事的最终结局打下伏笔。当休提醒哥哥迈克尔马琳劣迹斑斑,甚至曾经一把火烧掉贝纳拉高中时,迈克尔表示并不在意她的过去,甚至说,“我爱她,我这辈子都没有这么爱过,爱她的机智,她的勇气,她的美丽。我爱这个偷了多齐的画的女人,这个读过《神奇的布丁》的女人,这个假造目录的女人……”(238)于是在情感的左右下,迈克尔买来修复名画的所有材料,疯狂

制作名画《带电的怪人》。“然后他们就会求助于搜索光,红外线,X光片,最终两人发现处于一种非常亢奋的状态中。”(232)这种疯狂的举止难以掩饰他们内心的恐惧,“我噩梦连连,化学品、雷保灵油漆、水粉颜料、白酒精、松脂,一切都以灾难结束,我被关在一个外国监狱里,‘怪人’被洗掉了。我时常受到莫名的惊吓,哭叫着,一次次睡梦中惊醒。马琳也好不了多少。”(245)小说中弟弟休多次回忆起母亲害怕自己或者家人也会像猪一样被人宰杀,因为她相信“如果你看到一个人死去,记着,你也会遭遇同样的下场;在早晨就应想到你不会活到晚上,当晚上来到时,不要答应早晨的事”(51)。她甚至把这些哲理性语言做成一幅刺绣艺术品,悬挂在墙上,以警示家人。弟弟休是迈克尔的另一自我,凯里巧妙地利用交替叙述手法,展示了迈克尔精神世界中了的两个自我。

迈克尔如同一个在欲望都市中迷失了自我的羔羊,最终选择了从美国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从而完成了人性的自我救赎,也给小说深藏的宏大命题——我是谁、将走向何方一个答案。无论是由于他认清了整个艺术界、尤其是美国画界丑陋的本质,还是因为害怕自己的恶行遭到报应,他的回归至少是一种艺术和道德本真性的回归,昭示了真善美战胜假丑恶的道德力量。然而,在小说的结尾,凯里再次展现了他高超的艺术手法,让读者在始料未及的结局中感到震撼。五年后,迈克尔收到了路德维希博物馆的来信,邀请他去看悬挂在他们非常重要的博物馆里的画。当看到自己的两幅画《我,发言人》和《如果你曾看见一个人的死亡》被“置于显赫的地位”时,他感觉“他被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拯救了出来”(248)。同时,在他身后,那副由他修复的名画《带电的怪人》也赫然悬挂在那里。而此时的马琳也在世界的某地方,给他发来了表达思念的情书。凯里的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开放式结尾,让人再次陷入了“我是谁、将走向何方”的沉思。

从上述两部小说可以看出,凯里的小说是充满道德张力的文本,散发着追求真善美的人文精神,并通过一个个故事演绎着其以人为本的伦理思想。他善于设置对立的两极,让小说在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的冲突中推进情节发展,甚至由死亡来诠释生命政治和道德张力。如《幸福》中利己主义者贝蒂娜在公司爆炸中死亡,《偷窃一个爱情故事》中的被称为画家敌人的鉴定商奥利弗被人神秘地杀害……无不显示人性凶恶的极致。同时凯里又模糊二元对立的分界线,让伦理主体在非此非彼的中间地带辗转游移,充分展示他们在转变过程中的迷茫、痛苦和无奈。如乔伊发誓从善后又不得不向贝蒂娜屈服,迈克尔追求艺术的本真却又违心地帮助画商制作赝品……凯里就是这样通过建构—解构—再建构人物形象或者道德主体身份的艺术手法,来揭示人性的

(下转第85页)

## 注释:

- ① “被缚的朱克曼三部曲”(Zuckerman Bound Trilogy)由第一部《鬼作家》(*The Ghost Writer*, 1979)、第二部《解放了的朱克曼》(*Zuckerman Unbound*, 1981)、第三部《解剖课》(*The Anatomy Lesson*, 1983)及其尾声中篇小说《布拉格狂欢》(*The Prague Orgy*, 1985)四部小说组成。
- ② 小说文本引文均选自纽约的 Fawcett Crest 公司出版的 *Zuckerman Bound Trilogy* 的合订本;所有引文均由笔者本人翻译,文责自负。因论文中所引述的文本引文都出自这一版本,且引文较多,以后出现小说文本引文时只标注该版本的页码。
- ③ 此处为作者讹误之笔,《忧郁的解剖》(*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并非格雷作品,实为英国散文家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所撰,首版于1621年,在随后的30年里不断扩充;该书貌似医学书,实际上是对人类知识匮乏和能力有限的讽刺;此书成功地对人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忧郁进行分析和归类,对后世影响颇深。
- ④ 《天使望故乡》(*Look Homeward, Angel*)系美国著名小说家托马斯·伍尔夫(Thomas Wolfe)的自传体小说,出版于1929年。
- ⑤ 《魔山》(*The Magic Mountain*)系德国著名小说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创作于1924年的小说,小说手法多样,熔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入一炉,被誉为20世纪德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托马斯·曼因为小说创作领域的杰出艺术才能而荣膺192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 参考文献

- [1] Brent, Jonathan. “‘The Job’, says Roth, ‘was to give pain its due’” [A]. In George Searles (ed.). *Conversations with Philip Roth* [C]. Jackson and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2: 140.
- [2] Cooper, Alan. *Philip Roth and the Jews* [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上接第80页)

复杂和多变,以至于读者无法用非黑即白的价值判断,来理解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便是在刻画反面的人物形象,凯里也似乎张扬一种包容的人文精神,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他们的人性光芒。这种从非此即彼,到非此非彼,再到此时彼的主体身份建构既是现代人陷入现实困境的写照,也是凯里具有人文精神的伦理思想的体现。

## 参考文献

- [1] Bell, Philip & Roger Bell. *Implicated: The United States in Australia* [C].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2] Carey, Peter. *Bliss* [M]. London: Faber and Faber Ltd., 1981.
- [3] Carey, Peter. *Theft A Love Story* [M]. NSW: Random House Australia Pty Ltd, 2006.
- [4] Carter, David. Australian popular culture: Models of cultural influence and originality [A]. In Cynthia Vanden Driesen & Adrian Mitchell (eds.). *New Directions in Australian Studies* [C]. New Delhi: Prestige Books, 2000: 68-81.
- [5] Craven, Peter. That Redeeming Black Magic [N]. *Sydney Morning Herald*. 9 August 2003: Spectrum 14-15.
- [6] Jose, Nicholas. Bliss and damnation: Peter Carey in Australia [A]. In Andreas Gaile (ed.). *Fabulating Beauty Perspectives on the Fiction of*

of New York Press, 1996.

- [3] Roth, Philip. *Zuckerman Bound Trilogy* [M]. Fawcett Crest: New York, 1985.
- [4] Roth, Philip. *Patrimony* [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1.
- [5] Roth, Philip. *Operation Shylock* [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3.
- [6] Roth, Philip. *Sabbath Theatre* [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5.
- [7] Searles, George. *Conversations with Philip Roth* [C]. Jackson and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2.
- [8] 张生庭. 冲突的自我与身份的建构——菲利普·罗斯《被缚的朱克曼三部曲》研究 [M].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8.
- [9] 张生庭. 与影共舞——《解放了的朱克曼》中的‘自我’隐喻解读 [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2): 100-104.
- [10] 张生庭, 张真. 自我身份的悖论——菲利普·罗斯创作中的身份问题探究 [J]. 外语教学, 2012(4): 78-93.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 <西部项目> (项目编号: 10XJA752003) 和陕西省教育厅重点基地项目(项目编号: 12JZ032)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生庭, 西安外国语学院英文学院/西安外国语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为英美文学, 尤其是美国犹太文学。

张真, 西安外国语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硕士, 研究领域为英美文学、商务英语。

收稿日期 2015-01-04  
责任编辑 周永平

*Peter Carey* [C]. New York: Rodopi, 2005: 137-148.

- [7] Leavis, F. R. *The Great Tradition* [M].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53.
- [8] Neilsen, Phillip. 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 An interview with Peter Carey [J]. *LiNQ*, 1987(3): 66-73.
- [9] Stewart, Annette. Unpneumatic Bliss [J]. *Quadrant*, 1982(6): 87-88.
- [10] Turner, Graeme. *Making it National: Nationalism and Australian Popular Literature* [M]. Sydney: Allen & Unwin, 1994.
- [11] Turner, Graeme. Nationalizing the Author: The celebrity of Peter Carey [J]. *Australian Literary Studies*, 1993(2): 131-139.
- [12] 彭青龙. 彼得·凯里小说研究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1.
- [13] 徐其萍. “大森林三部曲”的生态伦理悖论 [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09(2): 70-73.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澳大利亚现代文学批评史”(批准号: 12BWW037)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彭青龙,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博士, 主要研究澳大利亚文学。

收稿日期 2014-11-06  
责任编辑 孙毅